

「日本統治台灣初期之米價騰貴問題」評論意見

第四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

吳聰敏*

2006.8.25

本文討論日治初期台灣的米價變動以及總督府對於米價變動之政策。作者根據日治初期的總督府檔案的文字記載與統計資料，分析日治初期台灣各地米價變動的情況。台北的米價從1894年開始上升，1898年達到最高。作者推論，1898年的米價劇升主要是米穀大量輸移出所造成。在第5節中，作者比較了清治末期與日治初期的官員對於米價上漲所採的政策。

本文除了詳細描述日治初期的台灣各地的米價變動之外，文中表2列出台北1875-1898年之米價（山田伸吾調查）；圖1列出1896年1月至1898年12月的米價統計，這些都是珍貴的統計資料。特別是前一資料，由清末持續至日治初期，更是難能可貴。以下的意見，一方面是補充作者對於1898年米價上漲的分析，另一方面則討論作者於米價政策之評論。

1 米價上升的原因

從清末到日初，台灣並無全面性的物價管制，米價基本上是由市場供需所決定。台北的米價（花螺最高價格）從1897年的8.65圓/石上升為1898年的11.495圓/石。從供需的角度來看，米價上漲可能是因為需求增加，也可能是因為供給減少。另此，還有另一個可能性：米價是隨著一般物價而上升。作者認為1898年的米價上升是供給減少（出口增加）所致。

若不考慮存貨變動，島內的供給量應該是產出加上淨出口。此一時期的米產量統計並無可靠統計。就進出口而言，依文章表4所示，1898年的出口比前一年增加192,241石，但進口也增加192,538石。換言之，相較前一年，1898年的淨出口並未增加，反而減少297石。因此，如果產量與前一年相同，而島內需求量的變化也不大，則1898年的出口增加應該不是米價上漲的原因。

不過，以上的推論假設台灣的稻米市場是一個整體市場（integrated market）。事實上，日治初期台灣的交通非常不便。作者在3.1節提到，新竹地區之稻米並未

*台大經濟系，聯絡：ntuto19@ntu.edu.tw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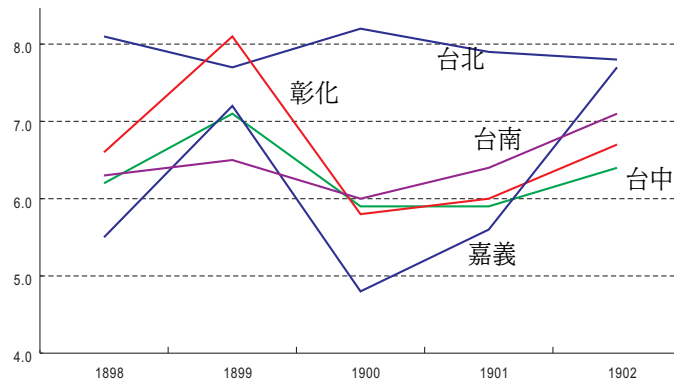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: 台灣各地米價: 1898-1902

本圖之米價為產地價格，單位：圓/日石。資料來源：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（1905），第5號表。

運到台北銷售；5.2.3節提到，新竹土紳到淡水買米，但面臨的問題是：如何將米運回新竹？這都是交通不便的結果。因為交通不便，在縱貫鐵路通車之前，台灣各地之米價差異很大。圖1是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（1905）之米價調查結果。1898年台北的米價為8.10圓/石，嘉義米價則只有5.50圓。另外，1900年台北米價略上漲，台中，台南等地之米價則大幅下跌。反之，1899年台北米價略下降，台中，台南等地之米價則大幅上升。因為各地方之米價變動趨勢不同，我們不能以台北米價之變動代表台灣米價之平均變動。同理，台灣的稻米總出口量也不一定能夠解釋台北的米價變動。

1.1 1898年之台北米價

從清末開始，除非是豐年，台北之稻米無法自給自足，必須以進口補足。由總督府檔案之文字敘述，1898下半年台北稻穀欠收（頁13），必須大量進口稻米。反之，該年上半年早稻的收成似乎不差。《臺灣協會會報》在1901年的一篇報導中提及，1898年台灣的稻米出口多，但進口也多。原因是該年上半年台灣稻米豐收，稻米大量出口；但了下半年，稻米又欠收，因此自國外大量進口。¹

綜合各項證據，1898年上半年台灣稻米豐收，而日本的收穫不佳，因此，台灣出口大量的稻米到日本。台灣稻米主要出口地是在中南部，但出口增加的確會促使台北米價上升。到了下半年，台北米價上升則是不同的因素。因為收成不佳，稻米供給減少；雖然商人自國外進口稻米，但台北米價仍然上升。換言之，下半年米價上升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收成減少所致。

¹參見“既往五年間臺灣に於ける米の輸出入”，《臺灣協會會報》，第36號，頁46-47，1901年9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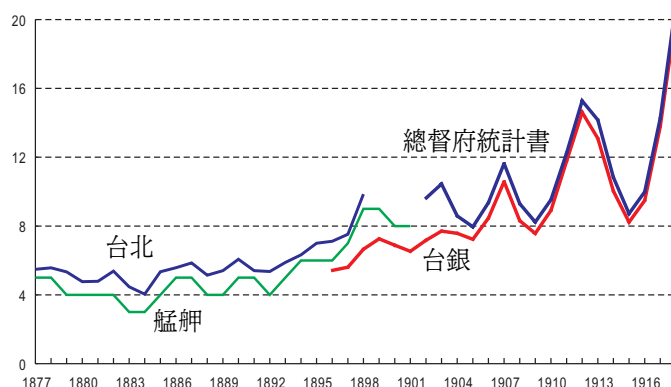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: 清末至日治初期的米價

單位: 圓/石。「台北」為引自總督府檔案之台北縣米價, 山田伸吾所調查,「艋舺」米價引自佚名(1902),「台銀」米價引自臺灣銀行調查課(1919),「總督府統計書」為台北躉售在來米價格, 引自期之《總督府統計書》, 但1904年無資料, 取自《臺灣米穀要覽》。

1.2 日治初期的米價上升趨勢

縱貫鐵路逐段通車之後, 各地之米價漸趨均一(吳聰敏·盧佳慧, 2006)。圖 2 畫出清末至日治初期台灣米價的變動, 其中之「台銀」取自臺灣銀行調查課(1919)。若此項米價為全台之平均米價,² 則圖 2 顯示, 1896 年開始, 米價呈現上升趨勢。日治初期, 米是一般家庭最主要的消費支出, 米價變動幾乎就是代表消費者物價指數之變動(吳聰敏, 2005)。因此, 1890 年代下半米價之上升除了反映米價與其他商品相對價格之變動外, 也反映一般物價之上升。

經濟學的分析指出,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的根本原因貨幣供給增加。臺灣銀行調查課(1919) 書末之附圖, 清楚呈現 1898–1917 年之間, 通貨與米價的確呈現亦步亦趨之關係。³ 另外, 吳聰敏(1998) 也指出, 日治初期之名目工資率之確也呈上升趨勢。例如, 台北的木匠工資率在 1896 年為 45 錢/日, 1899 年上升為 70 錢。這也間接印証一般物價上升的說法。

綜合以上所述, 1898 年上半年台北米價的上漲與稻米出口有關, 下半年則是因為收成不佳。此外, 貨幣供給的增加可能也促成米價隨一般物價而上漲。

2 政策之比較

第 5 節裡, 作者比較清國與日本政府對米價上漲所採取的政策。米價上漲時, 清末政府可能採取的政策包括: 禁止運出米穀, 限制米價, 派船赴海外購入米穀等。

²原書並未說明資料來源, 但與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(1905) 所載 1898–1902 年之全台平均比較, 兩項價格相當接近。1898–1902 年間, 臺灣銀行調查課(1919) 之米價分別為 6.65, 7.26, 6.89, 6.53, 與 7.17, 單位為圓/石。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(1905) 之全台平均為 6.70, 7.20, 6.40, 6.70, 與 7.30 圓。

³不過, 台灣銀行於 1899 年才成立, 因此, 1890 年代晚期之通貨統計可能有較大誤差。

日治初期開始，總督府採尊重市場機制之作法，原則上不禁止米穀之進出口（頁17）。第6節的結語中，作者認為台灣總督府「重視的不是地方秩序，而是財政負擔」（頁21），此一評語似隱含不贊同之意味。

依經濟學之分析，總督府之作法是對的。米價上升若是由於天候不佳、收穫減少所引起，解決的辦法是進口稻米。如果政府並未管制進口，則稻米供給不足時，自然有商人進口。進一步而言，如果政府不給進口商特權，進口商之間的競爭會使進口米之價格壓到最低。清治時期由官府派船赴海外購入米穀，當然有助於增加供給，但效率較差。另外，稻米供給不足而使米價上漲時，進口商才有誘因儘速進口稻米，解決缺糧問題。如果在此時管制米價，進口商進口稻米的誘因下降，缺糧問題反而不能解決。

上面說明，日治初期台灣交通相當不便。若某地區因氣候不佳，而致米穀收穫減少，稻米進口可能因為交通不便而有所延誤。商人有能力進口稻米，但可能沒有能力作基礎交通建設。因此，政府要協助解決缺糧問題，首要之務是基礎交通建設。台灣總督府在日治初期大力推動基礎交通建設，不隨意管制米價，不禁止稻米進出口，與市場經濟學之論點相當符合。清國政府的作法表面上看似照顧百姓，即使能達到目標，但其實效率較差。

有趣的是，清治時期為何在稻米供給不足時，地方士紳會向官府陳情，要求政府出面解決？這是地方士紳的主動，還是官府的壓力？地方士紳是基於人道立場，或者其中有私利之考量？這或許是未來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。

參考文獻

佚名 (1902), “內地臺灣米價比較”, 《臺灣協會會報》, 51, 39。

吳聰敏 (1998), “1895年前後台灣的產出、工資與物價”, 台大經濟系。

—— (2005), “台灣的消費者物價指數：1902-1940”, 《經濟論文叢刊》, 33(4), 323-357。

吳聰敏·盧佳慧 (2006), “交通建設與生產力 — 台灣縱貫鐵路通車之經濟效益”, 未發表論文, 台大經濟系。

臺灣銀行調查課 (1919), 《臺灣の米價》, 台北: 臺灣銀行。

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 (1905), 《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事業報告第五回》, 台北: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。